

【高教史研究】

深隐的源流：近代中国大学之欧陆影响源探微

——以“巴黎情结”为视点

代 玉 刘 超

【摘 要】近代中国知识系统的发展始终受到域外学术的深刻影响。这些影响源除日本、美国、德国之外,或首推法国。近代中国大学与法国大学有异常密切的关联,这集中体现为其与巴黎大学在组织机构、学术交流、人才输送、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深度互动。这些深度互动的影响极复杂、深远。巴黎大学最集中地代表欧陆在中国的学术存在,代表西方优雅的他者在东亚的投影。这种跨国的密切交互,是当时中国学术建设与大学发展的重要国际背景。中国大学成长起来后,开始自觉追求学术独立和文化自主。然而,因基础薄弱和环境所限,中国大学与巴黎名校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国人孜孜以求的学术独立,也终未能实现。近代中国大学的知识演化历程,集中代表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艰辛探索,也代表东西方学术的深度碰撞与融合。这从侧面勾勒出一幅奇异的世界学术图景。

【关键词】主体意识;巴黎大学;大学模式;学科建设;国际交流;学术自主性

【作者简介】代玉(1976-),女,辽宁辽阳人,教育学博士,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高等教育、国际及比较教育、教育史、教育社会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等研究(天津 300350);刘超(1982-),男,江西赣州人,法学博士、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从事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史、政治哲学及知识社会学等研究,E-mail: charlouisdas@zju.edu.cn(杭州 310058)。

【原文出处】《现代大学教育》(长沙),2022.2.75~88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项目“建国初党中央创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战略智慧研究”,项目编号:BOA180049。

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制度主要从西方移植而来,大学制度亦然。因此,中国近代大学与西方大学有异常密切的精神渊源。它们在西方大学的基础上逐步演化,生成与之关系密切但形态有别的组织。现有的许多论述要么将西方做笼统化泛指,要么仅限于指向美国、德国等。事实上,在近代中国大学的发展历程中,除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之外,法国也曾对中国大学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延续到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文教和科技进展之中。本文以巴黎大学为基点,打捞几近湮没的历史暗流,考察中国大学与法国大学的深层交互,借以挖掘中西学术互动的历史镜像及理论意涵。

一、问题提出：充满悖论的“西土情结”

近代中国大学深受域外名校的影响。是时,许

多人长期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外国的办学模式和学术思路,许多名校都曾取法于外国名校。相当一部分人将自己留学时的母校或接触的其他名校作为中国大学改造的蓝本。许多高校还经常比附于外国名校,自抬身价。这种牵强的比附,折射出国人对这些学校的依附心理和主体意识的薄弱及自信的欠缺。此间,国人长期眼光向外,极为羡慕欧美名校,且积极效仿,其心态可谓羡慕交织。^[1]而其参照的样板,北美的主要是美国东海岸的常青藤名校,西欧的则主要是德国、法国的名校,特别是柏林和巴黎的名校。总体而言,国人形成强烈而持久的两种情结:一种是“西欧情结”,一种是“常青藤情结”。前者以“巴黎情结”和“柏林情结”为代表,后者则以“哈佛情结”和“哥大情结”为代表,尤以“哈佛情结”为甚。这些

高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大学的历史想象、路径选择及发展形态。是时,哥伦比亚大学乃蜚声世界的新教育、新史学中心,相当一部分中国名流出身于该校,如唐绍仪、蒋梦麟、胡适、郭秉文、马寅初、陶行知、冯友兰、金岳霖、顾维钧、宋子文、蒋廷黻等。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在中国政界、学界、商界的风头最健。而哈佛大学出身的中国名流也为数极众。20世纪20年代,东南大学的许多课程设置与哈佛大学深度关联,更有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精神传人在该校组成“学衡派”。^[1]1931年,梅贻琦出清华大学后,主要融合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模式创造新的办学格局。1936年,哈佛大学校友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后,也一直关注哈佛大学的改革,吸收其经验。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复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向近代“大大学”转轨的过程中,也明显吸收了哈佛大学等校的经验。然而,正是在对西方大学的急迫学习、效仿和崇拜中,许多中国大学曾一度迷失自我,忘了是在哪办大学、为谁办大学。这些国家的大学模式和名校经验,一直如遥远而充满魅惑的他者一样,影响中国大学的路径选择和方向设定。这些他者对中国大学的发展有利有弊,形成诸多助益,但也造成制约、误导等消极影响。在此生态下,中国大学的自主意识和能力无从谈起,也就难以维护学术主权。^[3]

钱穆深叹:“中国全国新式学校及其教育精神,其实皆已西化。”^[4]1931年,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专家考察中国教育后亦批评中国教育受外国影响过深,许多留学生推动教育变革时,“求中国之美化或欧化”^[5]。近代中国大学正是在与域外大学的互动中,形塑了中国大学的精神气质、学术网络和现实走向。这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西方大学。中国大学最初以日为师^[6],之后则一度采行美制。时人即称:“吾国新办教育,垂三十年。前二十年可称日本化,近十年可称美国化……一般有识者已感日化美化均不适宜……无论何国教育,必须本国化。”^[7]然而,从历史源流看,日本的大学主要取法于德国。^[8]

这提示我们,近代中国大学的域外资源,绝不仅仅是日本或美国;于此之外,至少还有深刻的欧洲渊源。

一般来说,19世纪的现代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5个国家或地区: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及美国。多数高水平学者、大学都云集于此。他国大学,“无论是就数量还是就国际声誉而言,都无法与这五个地区的大学比肩”^[9]。直到20世纪前期,能被公认为近代学术核心国的只有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它们构成世界主要的学术中心,尤以前3个老牌国家最强。全球主要的高水平大学和学术机构均分布在这些国家。其中,德国学术尤以彻底性令各国学者炫目和神往,号称“世界学术德最尊”^[10];柏林更是被公认为世界瞩目的学术之都,名校甚众、名流济济。许多留学他国的学子在归国前,往往将赴柏林游历、访学作为留学生涯的终点。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学术水平正迅速逼近西欧^①,但是,总体上说,国际学术中心仍在西欧,全球公认的顶尖大学也都在西欧。清华大学学子认为,清华大学在国内并不差,但是,若放眼全球,“国内有几个够得上美国大学的资格?更有几个敢望德国大学的水平线上瞧瞧”^[11]?

如此一来,近代中国大学在办学取向上也就出现诸多奇异的现象。第一,中国深受日本影响,但鲜有“日本情结”。蔡元培在民国初期任教育总长时,曾力图博采各国众长,但是,最后因人才所限,只能较多地师法日本。对此,蔡元培说:“现在我等教育规程,取法日本者甚多。”^[12]日本大学影响了清末民初中国大学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总体框架和中国大学的基本风格。^[13]早期的中国大学对日本大学的办学格局和水平极为推崇。京师大学堂对东京帝国大学、国内各高等师范学校对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效仿,都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大学甚少有“日本情结”。^[14]第二,哥伦比亚大学对中国教育界的影响深远,但只有极少的中国大学有“哥大情结”。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甚至直言,他并不向往那种规模宏大的名校(暗指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而是希望中国建成像普林斯顿大学那样小而精、以文理为中心的一流

大学。实际上,近代中国大学往往普遍呈现浓厚的“哈佛情结”或“麻省理工情结”。第三,留欧学子中以留英者最多,但是,中国大学在办学模式和风格偏好方面,却对欧陆大学模式有更多热情。1916年,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后的改革,主要参照德国古典大学模式,该模式又被推广到国内其他许多高校^[15]。第四,在办学水平上,德国大学比法国大学更为突出。然而,从学术辐射力来说,巴黎大学对中国大学的影响恐怕未必逊于柏林。德国和法国大学的模式乃是近代多国大学的主要原型,其中,德国模式对奥地利、美国、日本、俄国(苏联)等国的大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国大学也有其影响。在德国大学崛起之前,法国曾长期是世界学术和科技中心,法语曾是西方通行的世界语,巴黎是许多国家向往的学术重镇。德国大学最初也是在借鉴法国经验的基础上迅猛发展起来的。

统上可见,近代中国大学依存高度国际化的世界知识生态,其生成与演化受到国际环境的深刻影响。这也应该是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议题。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大学曾先后取法于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等。然而,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对美国大学的考量,对日本、德国大学的探讨亦时有所见,但是,对法国大学的挖掘,仍是其中异常薄弱的一环。有限的研究,亦往往仅关注大学区运动而未看到法国大学对中国大学的系统性的深度影响。^[16]这显然与历史实况出入甚大。若不对此足够重视,将难以真切把握近代中国大学发展的深层脉络、难以较完整地认知近代中国学术所处的世界环境,从而诱致对历史图景的严重认知偏差。

二、绕不过的“巴黎”:法国学术的中国投影

1921年,陈垣在刚刚成立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即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17]内中情结隐然可见。20世纪初以还,西方汉学和日本东洋学的成果逐渐传入中国,许多外国汉学家亦纷纷来华交流,这极大地刺痛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由此,

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呼声此起彼伏。^[18]而当时作为国际汉学中心的巴黎,显然是中国学人瞄准的首要目标。陈垣所提的问题,事实上是几代中国学人共同的心结。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国人。在中国拥有主场优势的学科领域尚且如此,在其他学科领域更是可想而知。面对法国学术,中国学界的羡慕、自卑与忧惧,隐然可见。

(一)大学区运动的巴黎之源

法国学术首推巴黎。巴黎是法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也是全球公认的文学艺术中心,其在哲学、数理、化学化工、法政、商科、社会学及农矿等学科领域的成就也稳居世界前列。巴黎名校甚多,尤以巴黎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等校最为知名。其中规模最大、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首推巴黎大学。该校可谓中法学术文教交流的中枢,也是当时公认的世界顶尖大学。1926年,清华大学的钱端升教授就不满清华大学的现状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而撰文呼吁变革。清华大学是当时美国在华重点扶持的院校,是各方公认的以美式制度著称的院校。钱端升本人出身于哈佛大学,并无留法背景(不过,其密友、著名法学家王世杰却是巴黎大学出身的红人),但是,身在清华大学的他,却念及法国大学。他表示:“清华应开办文理科大学,再逐渐趋于完美。该科性质类似于美国之普通科大学,或大学之普通科……若耶鲁之肄业院……似法国大学之文理科合并者。”^[19]“世界著名各国,俱有最高学府可寻:若法之巴黎,德之哈德堡,英之牛津,剑桥,新造之邦,如美,日等……亦有哈佛,东京帝国大学等。”^[19]钱端升认为清华大学应力争成为中国文理科的最高学府。他说:“改革计划若完全成功,则清华可为中国之巴黎大学;不甚成功,则清华可为美国式之小大学,若达德谟(即达特茅斯学院)者。”^[19]显然,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大学范型中,钱端升对法国名校独具青睐,特别是其首席学府巴黎大学。那么,当时的中国,是否有可能建中国的巴黎大学呢?时人很快对此进行了试验。

“巴黎情结”在中国最集中的呈现是在1927年开

启的大学区运动。这是一种全国性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实践。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主持大学院后,推动教育体制由参照美国转向参照法国,为实现行政学术化、学术研究化,推行大学区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仿照巴黎大学区组建江苏大学区,并组建一系列机构。此乃比照巴黎学术及高教体系的探索。^[20]当时,第四中山大学也欲与东西各国首都大学比肩,该校由留法元老张静江之侄、留欧多年且推崇法国大学的张乃燕执掌。

为保障师资质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就于1927年6月重新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由张乃燕主持制定)。^{[21][74]}其中规定副教授须在外国大学“得有博士学位”^{[21][74]}或“讲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21][74]};教授须“副教授完满两年以上教务,而有特别成绩”^[22]。当时,在多数发达国家,博士学位尚未成为获得名校教职的必要条件。相比之下,在落后的中国,此标准实不算低。孟宪承即称,中国大学“教员的资格已经是相当的严”^[23],然而,“实际奉行者殊少”^[24]。张乃燕在第四中山大学率先严格执行该条例。他认为,法国因严格的教师标准而保持师资的高水平,化学亦成为法兰西的科学;此前,中国大学教师的评聘标准过低,以后须尽速提高。他力行严格主义,“参照欧、美、日本先进国家关于大学教员资格的规定”^[25]重聘教师,要求中国学者开展高水平研究,向西方名校教师看齐,“为国争光”^[25],且须“在世界学术界取得声望后”^[25]才能成为教授。如此一来,该校在数年内竟无一人成为教授,^②即使在国内外名校任职过的许多名家,如芝加哥大学博士吴有训、哈佛大学博士竺可桢及钱端升、法国国家科学博士严济慈,以及闻一多、雷海宗等,均被聘为副教授。^[26]对彼时的中国来说,如此标准显属过严,以致全校教师普遍心生怨恨。26岁就成为清华大学名教授、曾向往巴黎大学的钱端升此时亦被聘为该校副教授。他非常不满,似乎“只有像巴黎、里昂那样的大学教师才配称教授”^[27]。

大学区运动引发普遍的抵制,最后不得不废止。这就是移用西方经验造成水土不服的突出表

现。一般地说,20世纪20年代末之前,建设中国式大学和中国式学术,仍未成为知识界的普遍共识,更没有成为普遍的、实质性的政策实践。许多人仍长期陷于对西方名校的模仿而不自知或难以自拔。直到1932年之前,南京中央大学(该校由原第四中山大学改组而来)的教职标准仍在对标巴黎大学,该校仍无一正教授。该校学人还痛陈:“我国教授之资格不过如此而已。所以即使天资聪明者,而其程度亦不过等于外国一个助教。”^[28]有人质疑:“就全体讲起,北平大多数的教授,学问比法国的副教授差的多,而待遇则比他们优厚。”^[29]朗之万(Paul Langevin)等人来华考察时也批评说,中国大学教授意味着高薪酬,而未必是高水平。由此可见,尽管大学区运动早已结束,但是,有关各方对巴黎的特殊情结并未终止,人们在观察和评论中国许多名校时,仍不忘巴黎大学这一参照系。

(二)巴黎名校对中国知识界的强烈魅惑

在1930年前,欧美名校博士回国后,一般可任名校教授,而在欧美名校,一般只能任讲师或助理教授。此局面日后才略有改观。一般博士归国可任名校副教授;欧美名校讲师回国后则可任中国名校教授。中西名校师资之差距,可见一斑。时人曾批评道:“初回国的留学生,一下就会以一个极高的地位被‘拉’了去。……实不是一个近代国家应有的现象。”^[30]当局也直言:外国名校博士“倘在国外,不过仅能充任技术机关助手或大学院助教。若欲升任主任教授……尚须费20年左右之努力”^{[31][83]};而在中国则“立即充任主任教授或总工程师之类矣”^{[31][83]}。中国大学师资水准及评聘标准,均与西方名校有相当大的差距。至于其具体情况,不妨先对当时法国名校的教师评聘略做管窥。

19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高校的发展进入新阶段。法国所有大学教授的资格及聘任,均有特殊规定。据黄仲苏记载^{[32][370]}:

法国大学的正式教授都是由教育部长聘任的。初从大学研究所或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的人,决不能立即做到教授,大概都要经过下列几种步骤:

(一)国立或市立中学教员,(二)省立大学或巴黎大学讲师……(三)省立大学教授。巴黎大学的讲师或教授在声(身)价及薪金两方面都比省立大学的讲师和教授更光荣,更为丰厚。所以省立大学的教授往往都希望被聘为巴黎大学教授,即或不可能,虽是巴黎大学的讲师,他也愿意的。

然而,若想被巴黎大学这类名校聘为教师,即使是讲师等,似乎也不易。从习惯上看,要获得巴黎大学教职往往需要下列资格^{[32][370-371]}:

(一)曾在巴黎大学研究院或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并已考得国家博士学位,(二)服务于中学或省立大学已在五年以上者,(三)教授功课确有经验,(四)所治学科已有发明或已有著作者,以上这几条大概是最低的限度。

“巴黎大学教授在法兰西人民心目中简直是成了一种学术界极珍贵的荣誉”^{[32][371]},但这“是要完全靠思想和学术的努力方能得着这种报酬——愈是难得,方愈见其为可贵”^{[32][371]}。

如此长时间的历练和严格的遴选,确保法国名校教授几乎都是成绩卓著的知名学者。这是同期中国名校难以企及的,也是其极为渴慕的。应当说,环顾全球,此时巴黎大学的学术标准仍可谓奇高。也正是这种师资评聘的高标准,确保了该校的高水准。这在成果质量、教授水准、升等要求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皆可见一斑。在中国学人心目中,巴黎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代表法国高校的巅峰。中国学者吴康(巴黎大学博士)1935年被聘为巴黎大学教授后,在国内引起轰动。

1930年前后,法国名校博士(甚至硕士)回到中国可任名校教授。而在法国,名校博士则往往进入中学或企业界任职,即便有幸受聘于大学,也是从讲师起步。事实上,在19世纪初的德国、法国,只有个别优秀而幸运的新科博士能获得大学教职,如此标准无疑远高于中国名校。因条件所限,中国的杰出学者只能在个别领域做出一流的工作,而无法在多个领域都有重大的开拓性贡献,即便再努力也“只能追求成为‘罗汉’而已,不可能成为‘菩萨’”^[33]。而

拥有这样一大批杰出学者的巴黎名校,被许多中国名校尊为典范,亦在情理之中。“巴黎情结”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

因此,国内青年学子对留学趋之若鹜,向往留法。诸多名校在读或已毕业的研究生,都纷纷出国深造,以至于在研究院求学也只是为留学做预备。有的学者甚至在成为教授后,仍赴巴黎留学^③。如此,中国知识界普遍有着对巴黎的特殊好感和强烈向往。中国大学渴慕巴黎名校,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取法和对标对象,且希望加强与法国名校(首先是巴黎大学)的联系以获取更多资源,提升自身水平和声誉。这种持久而强烈的意念与行动,可谓是近代中国知识界的“巴黎情结”。从历史视角看,这种情结无疑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大学的进程及其对欧陆学术的历史想象。

三、交流与竞合:知识、制度与人才的辐射

从20世纪20年代起,“巴黎情结”成为中国大学发展进程中最具影响的情结之一。在其影响之下,带着对发达国家的尊崇和向往,也带着来自西方国家的刺激,中国大学进行诸多探索,积极向西方学习并加强交流合作。中国大学在有主场优势的汉学研究方面致力于赶超巴黎,力图将汉学研究中心夺回中国;在其他学科领域,则积极向法国学习,加强对法交流,并大力派送和延揽优秀的留法人才。这在文、法、理、工等主流学科领域均有诸多举措,中国也确实受益匪浅。蔡元培、李石曾等曾留法数年,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学术文教并不陌生,由此成为中国借鉴法国模式、加强中法交流的主要推手。法国模式正是通过多种渠道对中国的知识进展产生全面的纵深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

(一)学术体制及平台机构建设

法国在学术管理和大学建设上极富经验,在这方面对中国亦多有协助。为此,中方先后设立中法大学、北平研究院等,还与法方协商设立里昂中法大学(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中法庚款基金会(Commission Mixte des Oeuvres Franco-Chinoises d'Education)等,推动中法交流。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不久,北平研究院也借大学区运动之机,于1928年成立。二者关系微妙。北平研究院有明显的法国印记,在中国学界别具一格。不仅其骨干力量中多有留法归国学人,且在办院理念、学科划分、治理方式、机构设置等方面均有法式风格。北平研究院对文艺的重视,亦是中央研究院所不及的。该院由留法派主导,李石曾、李书华、严济慈、刘半农、朱洗、陈尚义等人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批学人还以该院为基础组建史学研究会,在学界颇有声势。北平研究院在物理学方面比中央研究院更胜一筹,设立了专门的镭学研究所。镭学研究所的骨干人物如严济慈、郑大章等,均毕业于巴黎大学。北平研究院成为华北文史及理化科学研究中心之一,其原子科学研究尤其出色。北平研究院和中法大学是中国境内受法国影响最深的机构,是法国直接发挥对华影响的重要管道,代表法兰西学术在中国的存在。同样,在法国里昂也设有中法大学,二者在东西方遥相呼应。

私立中法大学于1920年在北京成立,它是在民国初年由蔡元培组织发起的留法俭学会、法文预备学校和孔德学校的基础上组建的。随后,该校逐渐发展壮大,并于1931年春成立镭学研究所。李石曾任该校董事会董事长,蔡元培为首任校长。里昂中法大学是近代中国在海外设立的唯一大学类机构。该校的建立是20世纪初中法文教交流的产物。为了赋予在法留学运动一个更固定、更有效的形式,许多人产生在法国创建一个中国大学的想法。于是,蔡元培报请孙中山批准,将中法大学海外部设在里昂,对外称里昂中法大学。中法双方商定,依照法国有关规定,于1921年正式注册成立相关协会;其董事会有创办人12人,其中有6位中国人。里昂中法大学的实际决策和管理以法方为主,招考工作则由中方负责。作为中国大学的海外部,里昂中法大学是中国大学海外办学及国际合作办学的重要尝试,在中法文教交流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有效促进了两国对彼此文化和民情的了解,还培养出不少科教及文艺界的中坚力量。应当说,在名校众多的学术

重镇北平,中法大学不算突出,在科研方面也不及北平研究院,但是,其在留法及法语人才培养方面成就显赫,冠居全国。北平研究院、中法大学及中法庚款基金会,都发挥了桥梁作用,成为中法交流的中枢。

在巴黎的文化机构中,另一个重要存在是巴黎中国学院(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s Paris)。1919年,叶恭绰赴欧美考察时,与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会面。叶恭绰意识到,素来自负的西方人对西方文明的信心已普遍有所动摇,开始向东方文明求助。为了“国家之荣誉及我国学术之前途”^[34],叶恭绰便建议法方在巴黎大学设中国学术讲座、创办中国学院,并在欧美各大学推设相同的学院,以弘扬中国文明。叶恭绰的建议得到班乐卫(Paul Painlevé)等人的响应。在两国要人的倡议下,巴黎中国学院于1920年3月成立,^[35]伯希和也参与创办该院。在法国外交部的支持下,以伯希和为代表的汉学家终于在1927年获得学院的领导权。该院日后发展为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和东方文史学者向往的殿堂,造就了一大批中国学子和汉学研究者。^[36]

(二)学术交流与合作

中国积极推动中法交流,法国有关机构和学者也以多种渠道积极促进中国的学术文教工作。民国时期,这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法国学者当属伯希和、朗之万和哈达玛(Jacques S. Hadamard)等人。

以伯希和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家,是近代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影响力量。1908年,伯希和到访中国,与中国官员学者过从甚密;1932年及1935年,他又两度来华交流和搜集资料。伯希和是当时西方的汉学巨擘,是最早对中国学界产生强烈冲击的域外汉学家之一。正是伯希和等人的努力,确立了巴黎在国际汉学界的中心地位。在中法的人文交流中,伯希和及其友徒有重要的作用。19世纪20年代,傅斯年在欧洲留学时,即“睹异国之典型,渐中土之摇落……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37]。20世纪初,伯希和来华与中国学者进行广泛交流并产生深远影响,加剧了中国学者的危机感。他对中国学术的一系列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近代学术发展

的路向,其活动也激发了中国学者争夺汉学研究国际话语权的斗志。伯希和与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几辈中国学者都有密切交往,并极为推崇王国维、陈垣这两位知名的世界型学者。继此之后,陈寅恪成为又一位国际知名的中国史家,而且是首位具有深厚留欧背景的世界级中国史家。

1932年底,伯希和抵北平开始长达数月的交流,以调查近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书籍。中方热烈欢迎,并邀其参观了许多著名的学术机构。^[38]傅斯年在接待伯希和时说:“说到中国学在中国以外之情形,当然要以巴黎学派为正统。”^{[39]23}他还说:“近八十年中,以最大的三个人物的贡献,建设出来中国学上之巴黎学派。……伯先生固是今日欧美公认之中国学领袖,其影响遍及欧美日本,今且及于中国。”^{[39]23-24}伯希和直言陈垣是当时中国史学界最高的权威。^[40]伯希和回欧洲后,仍与中方保持密切交流。1939年,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即将退休,各国学者参与竞逐该职,陈寅恪亦在其中。胡适写了推荐信,伯希和也答应助力。陈寅恪早年曾在巴黎受学于伯希和。此时,作为中国史学界的一把手,陈寅恪的作品代表当时历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有人称:“伟大的汉学家伯希和认为,陈先生……是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41]162}牛津大学学者修中诚(Ernest R. Hughes)认为,陈寅恪是仍在世的最伟大的唐史研究大师。这是首次在牛津大学“聘请一位中国人担任教授。……应利用这个机会提高英国的汉学研究水准”^{[41]162}。陈寅恪赴牛津大学任教,不仅可以切实提升该校的汉学水准,也有望通过跨国合作,提升整个西方汉学的水准。

193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邀请国际联盟派专家来华考察,指导中国的教育发展。1931年9月至12月,国际联盟派遣了一个考察团来华,其主要成员包括柏林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教授、前普鲁士教育部长贝克尔(Carl H. Becker)、法兰西学院(L'Institut de France)教授朗之万、伦敦大学经济学院(School of Economics in University of London)教授托尼(Richard H. Tawney)等。其中物理学巨擘朗之万具有

重要影响力。^[51]朗之万早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后赴剑桥大学,在汤姆逊(Joseph J. Thomson)指导下从事研究,与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威尔逊(Charles T. R. Wilson)等建立了深厚友谊。1902年,朗之万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4年,当选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院士。朗之万在国际科学界声望极高。他与居里夫人(Maria S. Curie)、哈达玛、伯希和及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等都有良好的联系。

考察团对中国学术文教机构进行广泛考察后,提交的研究报告以中译本《中国教育之改进》为名,引发广泛讨论。报告认为:“欧洲文化上之情形,与美国之情形相比,较适宜中国之需要……欧洲与中国之文明则颇相似”^[52]。这些观点出自欧洲专家之口,引起美国政学两界的激烈反弹。无疑,考察团对中国教育的这种评判,是以欧洲名校为参照系的。这也恰恰暗合了中国知识界对欧洲(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大学的特殊好感和对美国某些大学的若有若无的轻视之意(时人普遍认为美国大学参差不齐,伪劣的西方大学文凭多与美国高校相关)。

1931年12月,教育考察完毕后,朗之万受北平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之邀重返北平,于12月至翌年1月间在北京大学延续多次演讲。^[42]1932年1月,朗之万两度参观北平研究院,受到李书华、梅贻琦等热烈欢迎。^[43]其讲演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各地媒体竞相报道。《申报》赞其为“世界知名之物理学大家,对于磁学贡献尤为博大精深”^[44]。国人对朗之万的讲演表现出极大兴趣,常有听众数百人。朗之万热爱中国文化,并称他人生中有两大纪念。一是自幼在巴黎生活,受到美术文化环境的熏陶;二是年近六十时,有幸来到东方文化中心北平,北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5]朗之万在北平欣赏京剧并结识京剧大师程砚秋,还与之一道经苏联赴欧洲。朗之万对日军侵华十分愤慨。他回法国后,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尽了很大力,并经常宣传中国。^[46]朗之万回欧洲后,继续与中国学者保持交往。1932年,熊庆来到法国时受到朗之万的热情接待。严济慈与朗之

万也多有交往,多次和他通信讨论学术问题。^[47]朗之万唯一的中国弟子是汪德昭。1931年,汪德昭在北平聆听朗之万的讲演后,被其深深吸引。1933年,经李书华推荐,汪德昭赴巴黎求学,在朗之万的指导下取得一系列优秀成果。

朗之万在考察中国教育的同时,还与中国物理学家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流。1931年10月,他在北平的物理学者的宴会上建议,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应联合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增进交流,促进中国物理学的发展。朗之万还建议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后,应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与国际同行互通声气,加强交流,^[48]并表示愿为中国与国际的沟通作搭桥工作。朗之万的诸多建议和活动对中国物理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其推动下,中国物理学会于1932年8月在北平成立。会上,朗之万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首位名义会员。为加强国际联系,该会还先后邀请狄拉克(Paul A. M. Dirac)、波尔(Niels H. D. Bohr)等知名学者来华交流,推动了学术发展。学会还创办《中国物理学报》以加强交流。^[49]

此时,来华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朗之万的好友、世界数学会(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Union)副会长哈达玛。1920年至1921年,蔡元培以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兼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赴欧美考察,并拟聘请欧美教授名流来华任教或讲学。^[50]蔡元培在巴黎会晤旧友——数学家班乐卫并请其推荐人选。班乐卫介绍了4位学者:居里夫人、哈达玛、佩兰(Jean B. Perrin)、朗之万。^[51]这几位都是法国巨擘。然而,在1936年之前,除朗之万外,余者均未访问中国。

1936年,经熊庆来接洽,哈达玛应清华大学和中法教育基金会的邀请来华讲学。熊庆来在1931年留学巴黎大学期间曾受教于哈达玛,哈达玛也很赏识熊庆来。哈达玛来华前夕,熊庆来特撰文称颂其“天才既高,勤复过人,学问渊博,创作宏富,堪称大师……氏于哲学思想,教育问题……所见均甚深刻”^[52]。哈达玛与爱因斯坦亦有交往。1936年3月,哈达玛偕其夫人抵沪。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中

国数学会和中国物理学会等机构的代表前来欢迎。稍后,哈达玛在各方代表陪同下参观了中央研究院^[53],后在交通大学演讲,并由胡刚复等陪同赴杭参观并考察浙江大学。哈达玛一行赴日游览后,于1936年4月7日抵平。北平学界闻讯后,纷纷与其交往。哈达玛于4月9日正式接受清华大学的聘任,并与数学系教师交流。^[54]华罗庚、许宝騄等人曾到课受教。哈达玛还参加了一些学术活动,如参加熊庆来弟子庄圻泰的硕士毕业论文答辩。^[55]清华大学设宴欢迎哈达玛,北平各界名人数十人(含法国领事馆代办)均出席宴会。此时,美国数学家奥斯古德(William F. Osgood)、维纳(Norbert Wiener)正分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访问研究。因此,这两位教授及其夫人均参与了宴会。^[56]此间,清华大学举行成立25周年紀念会,哈达玛应邀演讲,表示“清华在文化上,驰骋世界”^[57]。哈达玛还应邀到中法大学演讲、到北平研究院参观,对各所设备情形及研究成绩颇为肯定。^[58]哈达玛夫妇于6月离平返欧,并受邀在莫斯科讲学。^[59]其在回国前说:“中国是一个极其使人留恋的地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各校的设备颇为完善,关于数学方面之研究,亦皆有特殊之贡献,与法国学校之水准,相差极其有限。”^[59]这些表态当然不无溢美,但是,哈达玛对中国的感情,可见一斑。抗战期间,哈达玛积极支持中国开展抗日运动。

哈达玛此行首次将偏微分方程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直接指导中国的数学研究,对中国的数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他离华后,庄圻泰、樊畿、吴新谋等几位学人赴法留学,均获哈达玛的大力帮助,吴新谋还入读巴黎大学,他们日后都成为颇有建树的数学名家。哈达玛在清华大学时,对青年教员华罗庚大加赞赏,并介绍华罗庚与苏联数论大师维诺格拉多夫(Ivan M. Vinogradov)通信。这对华罗庚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进入繁荣期和国际交流最活跃的阶段。上述法国顶级学者来华交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他们来华时都备受礼遇,全程皆有重量级媒体跟踪报道。他们的讲学

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学术文教的进展。在中法交流中,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顶尖高校,作为中法交流枢纽的中法大学、北平研究院等机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学科建设和人才输送

如果说大学区运动是短暂风潮的话,那么,法国高校对近代中国大学的影响则是持久和深远的,其中汉学、文史、艺术、数理化、法学等学科领域尤为突出。汉学以伯希和为代表,数学以哈达玛为代表,物理学以居里夫人和朗之万为代表。巴黎一直与中国高校保持友好的合作,在学术交流、训练留学生等方面的互动日益广泛,为中国培养了大量杰出人才(其中多人毕业于巴黎大学)。他们分布在不同的学科,各有其代表人物,也形成相应的影响。

在汉学研究领域及中法人文交流(特别是在早期阶段)中,伯希和及其众友徒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贡献甚大。在1924年前后,陈寅恪在欧洲游学时便经王国维介绍问学于伯希和,给伯希和留下了良好印象。同期,罗家伦、赵元任等亦游学巴黎大学并问学于伯希和。留学柏林的傅斯年,接触过伯希和的成果并从中吸收养分。朱家骅等早年也一度在巴黎求学。

巴黎是欧美首屈一指的汉学重镇,是汉学在西方传播的策源地,形塑了中国对巴黎的特殊感知和体认。巴黎大学出身的学者在中国学界的话语权相当明显。在汉学研究界,巴黎对中国学术有深刻的影响。尤其在蒙元史研究中,由于多语言优势,伯希和及其门徒学有专长,在国际上极具影响力,曾一度占据显著优势,为中国培养了大量杰出人才。除了陈寅恪、冯承钧、王静如、邵循正、韩儒林、翁独健等中国学人也都出自其门下,日后皆成为卓有成就的学者。翁独健最初留美,193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入巴黎大学深造。20世纪30年代的陈寅恪已成为国际名家,对西方汉学持保留态度,^[60]但是,他还是推荐弟子邵循正等人到巴黎等地深造,继续从学于伯希和。从20世纪30年代起,汉学中心已回归北平,北平成为世界知名的文化城,美国、日本、德国

等国人均来北平研修。事实上,伯希和等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并不限于此,巴黎的影响亦绝不限于此。这突出地表现在人文科学(含当时盛极一时的新史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等领域。

在史学和哲学等方面,徐炳昶、冯承钧、李思纯、凌纯声、裴文中、黎东方、王毓瑚、侯外庐、沈炼之、王养冲、张芝联、张申府、吴康、许思园、张竞生、许德珩等,均为留法出身。他们对法国汉学和新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助益甚大。著名史学家张贵永尽管在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但是,其服膺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及其后学的思想,并吸收朗格诺瓦(Charles V. Langlois)、瑟诺波司(Charles Seignobos)的《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之养分,为日后史学之路奠定了基础。留美学人蒋廷黻虽在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却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赴法工作并在巴黎考察,对法国学术亦有了解。而雷海宗在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法国史,其对法国学术颇为熟稔。20世纪30年代,北平赴欧访学的学人,如吴宓、蒋廷黻、向达、冯友兰、朱自清、浦江清等,都曾到访巴黎,有的还与伯希和等接洽。

在文学/语言学方面,陈登恪(陈寅恪胞弟)、闻家驊(闻一多胞弟)、王力、张若茗、李金发、戴望舒、许渊冲等都是留学巴黎出身;成仿吾、章伯韬等则直接留学于巴黎大学。闻家驊曾在巴黎大学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校任职,后兼任中法大学教授。沪江大学毕业生俞大綱于1934年留学牛津大学,1936年毕业后赴巴黎大学进修1年。钱钟书的轨迹与之高度相似。钱钟书于1937年在牛津大学毕业后,也赴巴黎大学进修1年。谢寿康1914年由比利时转学巴黎,1919年和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巴黎组织华法教育会(Societe Franco Chinoise d' Education),1923年任里昂中法大学校董,日后履任要职,为中国对欧外交和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在艺术方面,徐悲鸿、张道藩、滕固、林风眠、李可染、刘开渠、刘海粟、林文铮、蔡威廉、汪日章、吴作人、吕斯百、吴冠中、程抱一,均为留法出身。巴黎

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艺术之都。许多艺术家留学,一般首选巴黎。如1928年,徐悲鸿推荐吕斯百留学时,直接推荐其赴法。

在数理化等学科方面,法国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中国数学界元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系的几位骨干,如何鲁、段调元、熊庆来,皆曾留法。何鲁、段调元均属把现代数学最早引进中国的学者。熊庆来于1921年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后创办东南大学数学系。1928年,熊庆来还赴清华大学创办数学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曾是南方的学术中心,清华大学是北方的学术中心之一,它们的数学学科都与留法学人关系密切。清华大学数学系基本以巴黎大学数学系为蓝本,而清华大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近代中国数学发展的引领者、标准制定者。熊庆来还请哈达玛来华指导数学发展。就此意义上看,民国中前期的数学研究无疑有深厚的法国渊源,巴黎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形塑了当时中国的数学进展。在物理学方面,一大批留法学者日后都与北平研究院或中法大学有密切关系,如北平研究院的李石曾、李书华、严济慈、钟盛标、钱临照等早期骨干和后来的钱三强、何泽慧等,均有深厚的法国学术背景。此外,施士元早年曾入读巴黎大学,成为居里夫人为中国培养的唯一博士。郑大章在人才济济的巴黎大学表现出色,受到居里夫人的欣赏,成为师从居里夫人学习放射化学的第一位中国研究生,并获法国国家理化博士学位。钟盛标也在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到居里实验室任研究员,研究原子物理。居里夫人逝世不久,严济慈与居里(Jean F. Joliot-Curie)同被选为法国物理学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ysique)理事。严济慈曾多次推荐青年助手到居里实验室学习,例如,1936年推荐钟盛标。杨承宗曾在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从事研究,1947年赴巴黎大学,随居里从事放射化学研究,1951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成为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居里夫人一家数代都对中国学者有特殊的友好,大力支持中国的高端人才培养和尖端科技(如原子科学)研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中的最重要的

一批专家中,钱三强、何泽慧、杨承中、汪德昭等都曾直接受教于巴黎的物理学家。这些留法学人归国后云集北京,使北京成为中国的原子科学研究中心乃至学术中心。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原子学科的发展曾直接受益于巴黎大学等校。

法国的法政学科及商学等亦极富影响,巴黎大学的法学尤其突出。近代中国的许多著名法学家及政治人物,如王世杰、谢冠生、魏道明、郑毓秀、杨秀峰等,均毕业于该校。此外,谢寿康、张道藩等,也都曾在巴黎留学。作家巴金、社会学家杨堃、生物学家朱洗、孟雨等,也都曾在巴黎留学,更遑论留法勤工俭学的大批学子。

法国的学术体制有其独特之处,其博士学位由国家授予,保持高标准。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刘半农身为北京大学教授,仍苦于没有留洋经历而在1920年赴欧深造,翌年由伦敦大学转入巴黎大学。经刻苦努力,刘半农终于在1925年完成博士论文。然而,在答辩时,刘半农极为紧张,其口试环节就达6小时。答辩仪式非常隆重^{[6]115},有6位知名专家,其中有以伯希和为首的3位汉学名家。刘半农“考完后两手撑着头靠在桌上……回家时都要人架着走了”^{[6]115}。法国名校博士保持非常严格的学术标准,教授标准更高,其师资水平也就得到制度的有力保障。

应当说,虽然巴黎名校甚众,但是,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大——巴黎大学来实现的。因此,在对华互动中,该校是法国学术系统的当然代表者。近代中国,留法精英多有巴黎背景;而由巴黎归国的头等学者,又大都毕业于巴黎大学。在巴黎的一众高校中,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作为大学校,享有崇高地位,但其与中国的关系显然没有那么密切。因此,中国与法国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与其大学系统,而非大学校系统的交流。在大学区运动中,中国亦基本未引入其大学校模式。1936年夏,胡适代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参加哈佛大学30周年校庆活动,也注意到巴黎大学。在参加活动的505个学术机构中,中国的

各个机构排名相当靠后,而西方大学普遍占据前列。胡适说^{[62][1200]}:

看到名次排列就发生了最大感触,第一名埃及大学,它成立到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第三法国巴黎大学也有九百年;第四英国牛津、第六英国剑桥。

而北京大学排名419位、中央研究院排名499位。胡适说:“说也惭愧,我们中国已具五千多年历史文化最早的古国,反屈居于最末的次序。”^{[62][1200]}胡适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不长、水平有限的问题深感痛心。

四、走出“情结”的努力、成效及限度

中国大学在与法国大学的交流中,有一个成长和觉悟的过程。在早期,许多学术交流意在引导和推动中国的学术进展。但是,事实上,许多接触并没有直接促成中国大学的学术自觉,反而使中国在对西方的接触中逐步迷失自我,面临自我放弃学术主权的危险。在屡经挫折之后,中国大学才开始逐步获得学术自觉,修复自身的内生能力,探索自主发展的道路。尽管对西方名校的向往和憎羨长期存在,但是,在大学区运动后期,中国大学的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探索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道路,挣脱西方名校的影响。当然,中国对域外情结并非简单机械地弃置,而是有意识地提升自身水平。当自身实力达到一定水准之后,便水到渠成地开始告别这种心态和境遇,自觉追求学术自主。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南方各大学声望日蒸,南北各地都出现一系列高水平大学群。中国大学为推动学术独立、争取民族独立,建设中国式的学术,经历了艰苦探索^[63]。有清华大学校友表示^[64]:

清华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学校,清华是为国际所注目的学校……说也惭愧,这在目下教育破产的中国,要算比较有希望的学校底清华,仅仅只有二十年的历史,比起欧西各国的先进大学的历史,那真相差得远了,真是一为先进,一为后生,虽然“后生可畏”,焉知非后来之不居上乎?

亦有清华大学校友说:“在目前的中国……彼此是混乱到了极端。”^[65]

中国学术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长足进步,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逐步达到较高水平。有外国学者说:“尽管资金缺乏,中国的科学研究还是在艰难中进行,并初具规模”。^{[66][21]}他们还说:“它证明中国人在某些领域是有能力创造自己的方法,取得成绩,继而又对外国的研究发生影响的。”^{[66][21]}美国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在科技方面“出现了一支高水准的专家队伍”^{[67][543]}。“有一小部分人在教育上的造诣达到了各个领域里现代知识的极高层次”。^{[67][605]}中国学、地学、数理等学科的进展清晰地显示,中国学术已有显著改观。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只有个别名校的学历得到美国名校的认可。北京大学的学历虽于1912年获得伦敦大学的认可,但是,总体而言,名校云集的欧洲对中国高校学历的认可度并不高。抗战时期,越来越多中国名校的学历得到欧美多国名校的普遍认可;欧洲名校普遍大大加强对华交流,其中就有英国和法国的顶尖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已承认国内大学研究部所给的学分,法国巴黎大学已承认由中国的学士学位可直接进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论文工作。”^[68]中国留学生在欧美的出色表现,赢得国际的高度赞许。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和欧洲开始有更多的科研合作。留英学者彭恒武还受托为巴黎大学培养博士生。牛津大学一改此前长期的保守矜持和倨傲,于1945年和1948年两次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及协和医学院的文理科学士毕业生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资格。^[69]这是对中国本科教育质量的充分认可,足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本科教育达到相当水准;科研工作也有所进展、颇具特色,某些领域还有特殊成就。^[70]

随着中国大学的整体性成长,国人开始转变心态,慢慢摆脱西方情结的支配,不再照搬和复制他国经验,开始更多地尝试平视西方大学,追求独立自主。然而,中国大学仍远逊于西方名校,这表现在师资水平、评聘标准、成果及国际影响力等诸多方面。尽管中国大学的教师评聘标准自20世纪30年代起

大幅提升,到20世纪40年代水涨船高,但仍与欧洲名校有巨大差距。因此,其科研实力和整体发展程度的高下也可想而知。

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主要有三种基本形式:职位、奖励(或荣誉)和引证。从现有资料看,在职位和荣誉(奖励)方面,中国名校虽不及巴黎名校,但亦不乏出彩表现。而在成果(论文)方面,则可用科学数据库(Web of Science)对中法两国的国际论文发表概况略做管窥。该数据库可呈现1900年至今,几乎所有国家/地区的部分《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论文的发表情况,可部分地折射出各国的国际发表和参与程度。20世纪上半叶,美国、英国的英语论文发表量大幅领先,其他国家则各具特点。中国大学自20世纪20年代起国际论文发表量持续猛增,且长期领先于法国,这可能与法国作为非英语国家的科研取向有关。

在教育/学术评价中,数量指标固然是重要参考,但终究只能反映一个侧面。实际上,尽管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大学开始有意识地赶超西方名校,并确实取得了显著进步(至少,使“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71]之宏愿在20世纪30年代已基本实现)。但是,因起点低、条件有限,其与西方名校实际上仍相去甚远。中国名校的水准不仅逊于巴黎大学,也不如里昂大学等校,难以与世界“有名大学并驾齐驱”^[72]。甚至作为顶尖国立名校的北京大学,经过多年努力仍未能完全“与世界名大学并驾齐驱”^④。1948年4月,“负有国际盛誉”^[73]的钱三强从巴黎归国不久就发现:较之西方强国,中国学术发展成效并不理想,“科学界的情形与若干年前没有多大区别”^[74]。清华大学等中国名校与西方名校(机构)的学术环境及水平仍有巨大差距。^⑤作为老牌学术中心的巴黎,其学术基础、实力和国际地位显然不是后起的中国所能企及的,二者之间仍有质的差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普遍进入集众式研究阶段,中国亦有所跟进,但是,实效不彰,在软硬件方面相形见绌,尤其在学术水平、知识生产方式、国际影响等方面,仍与法国有明显代差。中国在20世纪40年

代才开始渐具科学规划的雏形,而法国、苏联等国在一二十年前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原子能研究等尖端科技,就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此。

1937年,日军的全面侵华严重扰乱了中国学术的近代化进程。从抗战中后期开始,中国学术发展后劲不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紧紧咬住国际前沿的研究,已明显落后。“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正呈几何级数地拉大。”^[75]中西学术发展呈现强烈反差。也正是在此环境下,全国各界都更加迫切地呼吁学术独立,建设足以比肩欧美一流名校的“大大学”。然而,其实效并不理想。

余论:多线交错的国际知识图景

近代大学从西方移植到中国并逐步扎根,也在西方影响之下日渐成长。这种西方的影响既产生过误导,也发挥过实质性的支持作用。近代中国作为现代化浪潮中的后来者,对发达国家高度关注并形成某种情结,这是非常自然的。就此而言,中国大学的“巴黎情结”是时代的产物。而中国大学与法国大学之间的关联,绝不只是大量的人员往来(特别是中国学人留法并归国)。它远比人们以往所想象的要更深、更远、更丰富、更具张力。它还意味着中国学术体制的设计、学术文教机构的建设和运作、高等教育的治理模式、大学的目标设定、学科的分类和框架构建、人才队伍、资源汲取与配置等方方面面,都或多或少地与法国大学有某种联结。尽管近代中国的学术文教相对落后,但是,它并非孤岛,而是存在于全球学术网络之中,与发达国家的学术机构包括名校有异常隐秘而持久的深度关联,呈现出一幅生动而广阔的世界学术图景。这是近代中国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环境。在国内国际的特定环境下,中国学术得到长足发展,在诸多方面表现出色。但是,实际证明,中国大学与西方名校相比,仍有甚大差距。

具体到中法之间的学术联系,中国在制度模式方面的获益相对有限,但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成效显著。法国大学对近代中国大学的影响不止于当时,甚至延续到后来。在近代中国大学的发展历程中,东亚、北美和西欧的名校都对其产

生过深刻影响,法国大学可谓是继日本、美国模式之后的又一重要影响源。易言之,“巴黎情结”是仅次于“常青藤情结”的又一个深度影响中国大学演化的变量。在美国常青藤名校及柏林大学之外,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者,或当首推巴黎大学(20世纪20年代以后尤甚)。它是欧陆学术在中国的一个投影,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西欧在中国的学术存在,集中体现了中国对西方的想象和西方对中国的辐射。它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柏林大学等校,构成近代中国大学演化进程中最主要的几个影响源(见图1)。

学界以往论及近代中国大学的影响源时,大都只关注“洪堡模式”“常青藤名校”等,但对“巴黎情结”几无关注,这无疑有失偏颇。“巴黎情结”对中国大学有丰富的意涵,也产生了复杂影响。但是,总体而言,它更多地意味着资源和养分。在中欧交流中,中法之间的学术交流堪称典范,其中不仅有法国汉学家对中国的普遍友好,更有其他诸多学科领域的杰出学者对中国学术的积极支持和推动。这无论如何是不应忽略的事实。在近代中国,无论就学界的对华好感度而言,还是民意的认可度而言,法国都是欧洲各大国中最突出的(当然,这或许也与法国的东方战略不无关系)。而在近代欧洲诸大国中,以对华关系的密切程度言,法国或属首屈一指。

近代以来,中国在与西方的接触中逐步形成对西方的憧憬,其中就有对巴黎的向往。作为因羡慕欧洲强国所形成的一种符号,“巴黎情结”深度影响中国的大学建设和学术探索。对近代中国大学而言,巴黎既是一个有形的实体,也是一个多面多义的形象。它代表先进、普遍和优雅的他者,^[76]是学术生

产链的上游和规则制定者。而中国则是相对落后的他者,是异例和试验场。^[77]“巴黎意向”和“巴黎情结”,部分形塑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大学的体认。巴黎既意味着对中国的压力和挑战,也意味着对中国大学的鞭策和指引,由此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中国大学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势和感受中,进行灵活应对,实现长足发展。

中国大学的发展历程,始于模仿西方,成于自主创造。它因对域外名校的渴慕而积极效仿、谋求进步,在模仿中一度迷失自我;而之后,它也在模仿中逐步觉醒,获得长足发展。中国大学在成长起来之后,开始逐步告别对西方的崇拜,试图摆脱西方的影响,更多地强化主体性,力图实现自主发展(而主体性的获得,正是趋向成熟的开端)。易言之,其在学习西方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觉醒并争取文化自主、学术独立,力图通过世界性的知识贡献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对于“巴黎情结”,也大致如此。在与巴黎的互动中,中国大学先后经历了初识巴黎、歆羡并效法巴黎、试图追赶巴黎等一系列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渐成长的中国大学已绝少有中国的巴黎大学之语。中国逐步尝试摆脱“巴黎情结”的历程,是中国谋求学术自主的艰辛历程的缩影。

经过努力,尽管中国与西方名校差距有所缩小,但是,真正与其同台竞技时,仍有巨大落差。中国大学仍未完全实现近代化。因此,中法学术在低度发展与高度发达之间的鸿沟,依旧未能消弭。这是时势使然,其原因极为复杂,但主要或与学术基础和社会环境有关。在吴大猷看来,这“实实在在是因为整个国家的环境、学术的环境,再加上我们有战争这个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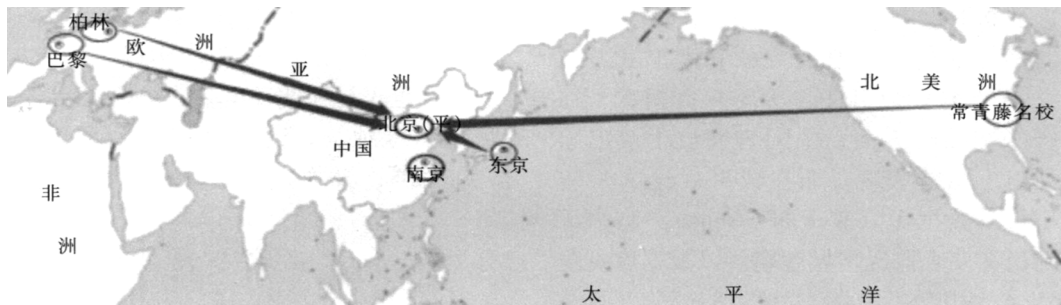


图1 近代中国大学的主要域外影响源

素”^{[78][35]},使中国学术最后“只有少许的发展”^{[78][35]}。这是历史本身的局限,是个体所难以改变的。至于中国学术自主性的实现,则更是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

注释:

①严格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大学已渐呈衰退之势,而美国大学则在加速崛起,日渐逼近德国名校,二者在1940年前后已基本持平,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迅速胜出。参见:胡钦晓.学术资本视角下德国大学之滑落(1870-1940)[J].现代大学教育,2020(2):60.

②直到数年之后,新校长到任后该校才恢复常规意义上的教授职位。而其中的关键人物,便是曾留学巴黎大学、受学于伯希和的罗家伦(曾在北方任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曾游学欧美各主要国家,对法国大学模式的熟悉程度,当不下于张乃燕(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参见:闻黎明.闻一多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22.

③当然,对于留学热潮的得失,也难以一概而论,需区分具体情况。参见:曹金祥.援西之辩:民国时期独立评论派的留学教育论争[J].现代大学教育,2020(1):69.

④此系当时胡适的宏愿。参见:邓嗣禹.北大舌耕回忆录[J].传记文学,1972(1):15.

⑤由于当时清华规定夫妻不能同校任职,何泽慧此时在与法国关系密切、留法派云集的北平研究院任职。钱三强亦在该院兼职。该院与清华在理化研究等方面多有合作。

参考文献:

- [1]方维规.民族主义原则损伤之后——中国150年羞愤情结[J].社会科学,2006(5):18.
- [2]牛力.倔强的少数:西洋文学系与学衡派在东南大学的聚散[J].民国研究,2019(1):162.
- [3]贾磊磊,李博.只有传统而不见当代,中国文化难以走向世界[N].中国艺术报,2014-12-05(8).
- [4]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57.
- [5]国联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M].国立编译馆,译.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
- [6]阿部洋.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M].东京: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0:176-177.
- [7]贵州教育厅.教育须中国化案[M]//中华民国大学院.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1.
- [8]金子勉.大学論の原点:フンボルト理念の再検討(〈特集〉大学論の新たな地平を探索)[J].教育学研究,2009(2):208.
- [9]华勒斯坦, I. 开放社会科学[M]. 刘锋, 译. 北京: 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5.

[10]黄炎培.吾师蔡子民先生哀悼辞[M]//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2.

[11]大众.提高程度么?增加学额么?[N].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12-26(26).

[12]蔡元培.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1912年7月10日)[M]//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7.

[13]范广欣.中国人的大学印象和中国大学理念的起源(1866-1895)[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48.

[14]阿部洋.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海外留学の展開——日本留学とアメリカ留学(アジアにおける教育交流——アジア人日本留学の歴史と現状)[J].国立教育研究所紀要,1978(3):5-6.

[15]侯怀银,温辉.洪堡大学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接受[J].现代大学教育,2018(4):48.

[16]张太原.“没有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反思[J].近代史研究,2011(3):104.

[17]郑天挺.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C]//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12.

[18]顾钧.曾经风流——汉学中心在北京[J].读书,2014(8):77.

[19]钱端升.清华改办大学之商榷[J].清华周刊,1925(333).

[20]叶隽.蔡元培的法国情结及大学区制移植的制度史意义[J].教育学报,2010(4):79.

[21]刘龙心.学术与制度[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22]佚名.大学教员资格条例[J].大学院公报,1928(1).

[23]孟宪承.大学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97.

[24]陈东原.论我国大学教员之资格标准及其聘任制度[J].高等教育季刊,1941(1):53.

[25]张乃燕.第四中大校长张乃燕就职演辞[N].申报,1927-07-29(11).

[26]南京大学校史编写组.南京大学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95.

[27]钱端升.我的自述[M]//钱端升.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696.

[28]杨开道.大学学生治学方法[J].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8):1309-1310.

[29]旭生.教育罪言(一)[J].独立评论,1932(25):8.

[30]蔡壬侯.大学与教授[N].大公报,1941-05-31(3).

[31]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32]黄仲苏.巴黎大学[J].新教育,1924(3).

[33]徐利治,袁向东,郭金海.我所知道的华罗庚与陈省身——徐利治先生访谈录[J].书屋,2007(5):19.

[34]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叶遐庵先生年谱[M].[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945:74.

- [35]葛夫平.巴黎中国学院述略[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2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427.
- [36]葛夫平.汉学家与巴黎中国学院的创办——以伯希和为中心的考察[J].国际汉学,2012(1):229.
- [37]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M]//杜正胜,王汎森.新学术之路:上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27.
- [38]佚名.东方学家柏希和(M.Peliot)抵华北平中法学者联欢[J].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931(1):116-117.
- [39]佚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J].国立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1933(5).
- [40]戴镛龄.梁宗岱与胡适的不和[M]//赵白生.中国文化名人画名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413-414.
- [41]转引自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J].历史研究,2000(3).
- [42]钱临照.中国物理学会五十年[J].物理,1982(8):449.
- [43]陈恂清.汪德昭院士传略[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5:29.
- [44]佚名.中央研究院请物理学界名宿讲演[N].申报,1931-12-09(8).
- [45]佚名.国联教育团昨日南下预定年终回欧[N].北平晨报,1931-10-30(7).
- [46]Langevin, A., & Langevin, P. Mon Pere[M]. Paris: EFR, 1971: 111.
- [47]ESPCI- CRH. Fond Paul Langevin[M]. Mission en Chine, 1932: 29.
- [48]物理编辑部.中国物理学会第一次年会资料[J].物理,1982(3):183-184.
- [49]王士平.中国物理学会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31-32.
- [50]戴念祖.爱因斯坦在中国[J].社会科学战线,1979(2):77.
- [51]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二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63-365.
- [52]熊庆来.哈达玛氏学术方面之经历及工作[J].科学,1936(9):713.
- [53]佚名.法国数理大家哈达玛氏夫妇抵沪[N].申报,1936-03-24(12).
- [54]佚名.世界算学权威者哈达玛今日开始在清华讲学[N].北平晨报,1936-04-10(9).
- [55]佚名.研究生庄圻泰毕业初试定于明日举行[N].北平晨报,1936-05-22(10).
- [56]佚名.梅贻琦定于十四日欢宴哈达玛夫妇[N].北平晨报,1936-04-11(9).
- [57]佚名.清华大学昨举行廿五周年纪念典礼[N].北平晨报,1936-04-27(9).
- [58]佚名.李书华昨招待哈达玛夫妇,并引导参观研究院设备[N].北平晨报,1936-06-14(9).
- [59]佚名.法数学家哈达玛昨晚离平返国[N].世界日报,1936-06-29(7).
- [60]刘超,王贺欣.休斯与牛津大学汉学科——近代中英人文交流史钩沉[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0(8):39.
- [61]赵杨步伟.欧洲游记[J].传记文学,1965(6).
- [62]胡适.海外归来之感想[J].正风(半月刊),1937(10).
- [63]宋旭红,沈红.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大学的学术独立之路[J].现代大学教育,2006(5):89.
- [64]潘如澍.写在后面[C]//清华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1931:1.
- [65]张近恒.离校后[C]//清华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1931:15.
- [66]许美德,巴斯蒂, M. 中外比较教育史[M].朱维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67]罗兹曼, G. 中国的现代化[M].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 [68]吴有训.关于理学院的一些看法[M]//郭弈玲,沈慧君.吴有训的科学贡献.厦门:鹭江出版社,1997:149-150.
- [69]牛津大学.牛津大学致国民政府教育部函(1945年7月20日)[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案卷号:3767.
- [70]渠敬东.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自主性问题[J].开放时代,2006(1):16.
- [7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C]//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1928:14.
- [72]徐宝璜.北大三十一周年纪念日之感想及历年毕业生之统计[C]//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1929:23.
- [73]葛能全.钱三强[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160.
- [74]王春江.裂变之光——记钱三强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141.
- [75]虞昊.中国科技的基石[M].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20.
- [76]王鸿生.知识发展的计划政治[M]//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474.
- [77]孙向晨.天下、文明与个体——今天中国人如何理解自己[J].文化纵横,2021(6):80.
- [78]吴大猷,黄伟彦.早期中国物理发展的回忆[M].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01:135.